

世 界 文 学 大 师 纪 念 文 库



# 劳维塔耶娃集

马海甸 主编

lary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茨维塔耶娃集

马海甸 主编

世 界 文 学 大 师 纪 念 文 库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茨维塔耶娃集 / 马海甸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1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ISBN 978-7-5360-6101-9

I. ①茨… II. ①马…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1182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贤治 欧阳衡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

书 名 茨维塔耶娃集  
CIWEITAYEWA 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7.5 1 插页  
字 数 527,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 编选前言

文学史源远流长。回顾时，我们当会发现，这个不断衍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与少数作家的天才的艺术创造密切相关。这是一群卓异的人物。对于世界和生命，他们有着独特的发现，而且凭借富于个性的语言，出色地表现这一切，包括伴同这发现的敏锐的感觉、想象力和无尽的激情，以及内在的更深隐的精神结构，比如社会理想、理性、道德、人格、美学原则，等等。他们彼此之间，无疑存在着天才的差异，但都以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构成“范式”，影响同时代人乃及于后世，形成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文学传统。当然也有沉寂一时者，但是，其文本的潜在的影响力是恒在的。对于这些作家，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文学大师”。

在此，我社编辑出版一套大型丛书《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旨在通过系列大师的介绍，显示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文学的高度。

丛书呈开放式，选材严格，每人一集；至于时代国族，则不设限界。一集之中，以作品为主，另行选入相关的传记及评论文字；每集前后均置有作者概述及生平年表，使读者对作家有更直接、更完整、更深入的了解。在译文方面，尽可能选用多家，冀有翻译史的线索可寻。对于翻译界前辈所做的开启性的工作，这也当不失为一种纪念。

因译者不同，译文先后发表时间不一，书中有关的人名地名等译法多有出入，为保持原译作的完整性，今仍其旧。

图片由多方搜求所得，是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不独装饰而已。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个累积性的文化工程。在编辑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学者、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同行的襄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意的感谢。

花城出版社

2008年1月

# 序

活得多么短暂，可是多么懂得人生！

——威·维契诺夫

时代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时代而存在。

——帕斯捷尔纳克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俄罗斯文学紧接着十九世纪黄金时代的灿烂之后，还有二十世纪初白银时代的辉煌；仰望文学星空，有四位巨星级诗人，他们是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其中最亮丽的是茨维塔耶娃，这颗星辰孤绝无比，一再刺破俄罗斯和苏联的漫漫长夜；“藏起一切，像融化的积雪与烛泪——被人遗忘得干净/将来化为一杯黄土/葬身坟头十字架下？我不愿意！”“用温柔手势挡住/没被吻过的十字架/冲向慷慨的天空/致以最后的问候/穿过霞光——响应微笑/我在临终的逆厄中，仍是诗人。”

茨维塔耶娃很晚才被中国读者熟悉，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不过，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熟悉的是从小说到电影都受追捧的《这里黎明静悄悄》，五个“花季”女兵在二战中壮烈牺牲，其中的女班长表示，“这可以理解，战争嘛。”但女兵长官瓦斯科夫毛骨悚然，担心后人追问“你们这些男人，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妈妈”？母亲是最具资格的英雄主义象征，这追问具有痛彻心扉、动人心魄的力量。

了解俄苏文学史的人，自有另一番悲恸与惋惜：“白银时代”与苏联时期最有魅力、最有才华、也最有思想深度、自愿由西方世界回到祖国怀抱的母亲与诗人茨维塔耶娃，后来去了哪里？她于1941年8月31日悬梁自尽，终年四十九岁。

—

令人扼腕的是，茨维塔耶娃本可以不回祖国，她明白“在某些时刻，祖国比异邦更危险，就像死亡比所有可能的不幸更危险”，她也因而一再推迟归期。但是，她终

于赶在斯大林大清洗年代回到苏联，当时是人人自危的 1939 年的 6 月。

在差不多时间里，同样在西方漂泊多年的沙俄时代作家库普林回国，受到当局热烈欢迎，又是献花、又是报告会、又是赠送豪宅。然而，人们私下纷纷打听的却是茨维塔耶娃的消息：“听说了吗？她回来了！”“知道吗，她到了！”1922 年去国，时隔十七年，诗人仍活在公众的记忆中，光辉不减，热力不散。这就是茨维塔耶娃。

苏联报章对茨维塔耶娃回国不透露任何讯息，其实是不祥的兆头。果然，诗人回国仅两个月，比母亲提早两年回国的女儿阿利娅就被国家安全部门逮捕，再过两个月丈夫埃夫隆也遭扣押。茨维塔耶娃全家的回国遭遇传到海外，白俄人士目瞪口呆。他们不会忘记，早年吃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苦头的茨维塔耶娃到了海外，特别是到了法国，也曾让白俄人士大跌眼镜——她不肯“反苏”，拒不参加诅咒“红色祖国”的大合唱。

白俄人士从茨维塔耶娃言论中嗅出异己味道，称“她的声音似乎是我们，但声调却是他们的”。“他们”即指十月革命和红色苏联。白俄人士的指责也没有错，茨维塔耶娃与白俄文学祖母级诗人吉皮乌斯及她的丈夫、知名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吵得天翻地覆，势不两立。茨维塔耶娃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借《可诅咒的日子》等大骂十月革命的布宁也搞得关系紧张，只是到后期才略微缓和。茨维塔耶娃尖锐地批评“国外侨民的俄罗斯是一个停滞的国家，艺术也一同沉沦，不可避免地倒退”。茨维塔耶娃更为国际社会拒绝苏联而愤愤不平，“仿佛那里除了白熊和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其他”。她在公开场合表示赞同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观点，“真理”在西方社会这一边，而“力量”在祖国苏联那一边。诗人“亲苏”，还因为目睹欧洲法西斯势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横冲直撞，而西方各国虚与委蛇，试图祸水东引。作为红色祖国的参照物，德、意法西斯的猖狂崛起，西方国家的“养虎为患”，必然“加深”诗人对祖国苏联的好感。

通过十年的侨居生活，诗人看清楚了，毕竟还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和爱伦堡等苏联文学家更接近她的价值观。茨维塔耶娃善待他们，写文章或演讲高度评价他们，甚至提名高尔基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对马雅可夫斯基印象特别好，认为他是“良心的苦行者”、“政治的受虐者”。1928 年诗人发表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录，她正在报上连载的长篇诗作遭到腰斩，接着几乎所有的白俄报刊都向她关闭发表园地。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决心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

海外过得艰难，也促成茨维塔耶娃“心向祖国”。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时举行诗歌

朗诵会，听众爆满，但收入不高，儿子穆尔说“人多钱少”，“钱柜空空如也”。茨维塔耶娃受贫穷煎熬，在信中对朋友诉说：“儿子咳嗽已八个月，火车票又贵得不可思议。”“我们生活过得很差，甚至不如去年，连马肉饼都没有，肉和蛋还从来没有吃过。”

同时，红色苏联在海外大力动员白俄侨民回归。茨维塔耶娃丈夫埃夫隆早年曾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到了海外后思想发生激变，由“白”变“红”，不仅大力支持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还卷入苏联特工在海外的行动。顺便说说，政治忏悔总伴随当事人出格的偏激，充满赎罪和献身的渴望，做事不懂坚持底线，说话也不知自我保护。“白”变“红”如此，“红”变“白”亦然，譬如，一些日本左翼文人三十年代转向极右军国主义。

埃夫隆的爱国热情强烈感染在海外长大的女儿阿利娅和儿子穆尔。在这样的氛围里，茨维塔耶娃也不甘落后，“我所说的俄罗斯——不是指它政权——是一个向前走的国家”。在一段时间里，诗人对共产主义也不太“拒绝”，“逆循环是我生活的规律。如此，我又怎么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我，很快整个世界都会如此！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丈夫和女儿等不及了，于1937年回到苏联。女儿不断写信，催促母亲和弟弟早日启程。1939年，茨维塔耶娃母子终于决定步父女后尘回国，行前好多人劝阻他们称，斯大林正在国内搞大清洗，不妨再等等。茨维塔耶娃一向预感灵验，真切感到回国是“万劫不复之旅”，可是仍然踏上了归途，当然也踏破了自己关于“自由”的底线。茨维塔耶娃一直到在异国火车站上给朋友写最后一封告别信时仍在犹豫，但“全家团聚”是她生命和血泪浇铸的信念，她没法超越和颠覆。

这就是为什么茨维塔耶娃回国后陷入绝境时，仅埋怨“阿利娅把我害苦了”之外，再无他言的原因。只是父女“替西方国家当间谍”的罪名，茨维塔耶娃实在难以接受。指称诗人在海外对苏联不忠，或许还有几分“口实”，可是栽赃一片丹心的埃夫隆父女，真是太残忍了。

### 三

俄苏文学史上多有坚毅、超人般的文学人物，茨维塔耶娃名列其中，但人家阴郁，她开朗；人家压抑，她奔放；人家困惑，她自信。“上帝给我另一个名字/大海<sup>①</sup>

<sup>①</sup> 茨维塔耶娃的全称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玛丽娜”在俄语中与“大海”的字根相同。

的名字，大海的！ / 给我另一种幻想 / 大海的幻想，大海的！ / 给我别样的情怀 / 大海的情怀，大海的！”

茨维塔耶娃的“大海性格”，在诗人刚踏入诗坛就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她当时只是十八岁女中学生，自费印刷诗集《黄昏集》五百本，亲自给两家小书店送货上门。她不屑请任何人写书评，仿佛书只要写成了、出版了、“被圈起来”，便心安理得了。她诗中也透着这种非凡气度，打动了中年诗人沃洛申，并写出诗体评论：“心灵这么快地被你吸引。啊，《黄昏集》洋溢着怡然自得、温馨宜人气氛！……我只注意到温顺驯服的目光，和天真幼稚椭圆形脸庞，孩子般的小嘴和单纯的动作，拘谨、安详以及端庄姿势……你的诗达到了不起成就……你到底是什么人？”

茨维塔耶娃立即用行动回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的询问。《黄昏集》问世遭到诗坛“天神”勃留索夫的酷评。少女诗人立即反击，反唇相讥称勃留索夫的诗出自书本和批评家的嫉妒，“不算出色之作”，他的“心是一盏小灯，而不是星辰……您，受伤的老头啊，您，伟大的诗人，重又向我偶露峥嵘”；“思想更有用，感情更激烈，等着瞧吧”；“军队越界了，无名小卒展开了军事行动”。茨维塔耶娃自卫性的凌厉反击，勃留索夫难以招架，笔仗轰动了文学界。

横看纵望“白银时代”和苏联时期，诗人和作家中唯有茨维塔耶娃最为“大气”：“做一个现代人，是要创造自己的时代，而不是反映”；“即使是反映，也要像盾牌，而不是像镜子”。她称，时代向她下达订单，而她进行创作是在对时代作贡献、对人性作贡献，“对自然加倍贡献”。如此壮怀激烈，连同时代诗人、充满豪情的马雅可夫斯基都望尘莫及。

创造自己的时代，不是徒托空言。不管是出国前或是移居海外，茨维塔耶娃一直借诗歌、散文、小说、剧本、随笔、书信和回忆录，批评红色祖国的阶级斗争，也抨击西方社会的利己冷漠。茨维塔耶娃凭着良知、勇气与信念创作和生活，“诗人服务于时代，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命中注定”；“狼不管怎样喂，它仍要望着森林。我们都属于‘永恒’这莽莽森林的饿狼”；“诗人与时代的婚姻是强制的，是在暴虐中强行注入了爱情，将苦役当作遵命效力，是强作欢颜或对多名恋人的一再背叛”。茨维塔耶娃更说：“来自政党的功利性的青睐，注定是要消亡的，但来自人民的青睐却不会。”

茨维塔耶娃既骄傲又谦卑，而最重要的，是勇敢。她不是诗坛领袖及文学统帅，但却具备领袖和统帅“志在开创”的情怀、理想、刚毅与仁慈，以及哲人般的探索精神。同时代诗人霍达谢维奇曾与茨维塔耶娃多年对峙，最终忍不住赞扬她“情感攻势如此强劲有力，如此源源不绝，承受这种抒情热流的喷涌，简直支撑不住”；“我和她的诗学有许多不同之处，虽然我很懊丧，但我仍要说‘我爱茨维塔耶娃’”。他目睹

茨维塔耶娃孤独面对苦难、恐怖和血腥，却颂赞浪漫、热情和理性，更高倡自由、平等、博爱。他敬佩她。

## 四

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绝笔留给儿子，“小穆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仍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字字句句沉痛则沉痛，但冷静异常，看不出半点哀怨。

茨维塔耶娃离世前连一份食堂洗碗工的活儿都谋不到，自杀似与此有关，这件事诗人的所有传记和相关文章都提及过。不，不是这样，也不可能这样。茨维塔耶娃生命中没有“一气之下而为之”的事，她更不会鄙薄洗碗工这样的体力工作。从婚后到离世，从十月革命饥馑到海外颠沛流离，这位才华稀世的诗人经历的所有岁月都是苦难，全是穷困，尽是“尴尬”。但她能源源不绝写出美妙诗句的手指，也能熟练地削土豆、砍柴、拉车和洗地板。

拒绝茨维塔耶娃洗碗工职位的食堂属于战争疏散地的官方作家团体，而终诗人一生，作家协会、文人小圈子一类何曾被她放在眼里过？她少女时代踏上文坛，就为自己绝不是响当当诗人团体一员而洋洋得意。茨维塔耶娃一生远离体制、蔑视奢华、厌恶权贵。但这一切汇聚成厄运，砸向诗人，并发出讥讽。

然而，茨维塔耶娃是能够被讥讽的吗？她拥有应对挫折的沉着镇静、抗击苦难的气定神闲和蔑视厄运的强悍刚毅。她早就写诗，“到时候取下琥珀/到时候交换字典/到时候熄掉挂在/大门上方的提灯”。美国硬汉作家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写过：“当你要死的时候，就坐下等着。”茨维塔耶娃的沉静就透着“你可以被打败，但无法被战胜”的硬汉作风。

## 五

1965年，茨维塔耶娃自杀已二十四年，她的丈夫埃夫隆和女儿阿利娅的冤案早获平反，苏共改革派推行“非斯大林化”也有九年，诗人一卷集出版与新一代读者见面，代表官方立场的评论家奥尔洛夫为新书作序时，仍不忘严厉批判茨维塔耶娃“狠毒地背离了人民”。奥氏之所以如此耿耿于怀，就因为茨维塔耶娃在十月革命期间写了组诗《天鹅营》等作品，表现了内战中一些白卫军成员，在注定灭亡的境遇下做出

赴死的抉择，仍保持“气节”。茨维塔耶娃的好友、名作家爱伦堡惋惜诗人写《天鹅营》等作品，成为重大政治“污点”。

《天鹅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首先，这是诗人献给丈夫埃夫隆的“安魂曲”。丈夫作为随军医务人员，追随败走海外的白卫军，音讯渺茫，凶多吉少。十月革命期间，丈夫生死未卜，茨维塔耶娃拉扯的两个年幼孩子，悲惨地落得一病一死。诗人立誓：只要丈夫仍活着，此生绝不分离，“不管你去了哪儿，哪怕天涯海角，我也会像一条狗似的忠于你，追随你”。

诗人和埃夫隆具有非同寻常的恋爱史。茨维塔耶娃当年一见钟情爱上自己半岁的未婚夫，并迅速结婚。埃夫隆当时具备诗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外表不威猛、不强悍，正在生病，唤起茨维塔耶娃心灵深处中最不设防的母性意识。埃夫隆也确实是优秀者，诗人别雷曾对茨维塔耶娃讲述自己的感受：“您的丈夫多好啊，那么沉着镇静，完美无瑕。战士就是这样。我多想当一名军官啊，士兵也行。截然不同的人，自己人，白的，多么宁静。要知道，我在教授身上寻找过它，但没找到。”

苏联文学史上不乏以“正面形象”表现白卫军的作品。阿·托尔斯泰长篇三部曲《苦难历程》主人公罗欣就是一个白卫军官，直到最后才投向红军。在小说中，罗欣自始至终作为好人出场，正直、善良、勤于思索……具备所有的正面品质，与红色作家笔下的共产党人正面形象无异。至于受斯大林和当局肯定的史诗长篇、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更不用说了。书中主人公葛里高利就是一个忽而投向白军、忽而投向红军、摇摆不定的哥萨克，但也是一个不失善良天性、不倦追问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他以自己的认知水平追求“自己的真理”，最终走投无路也没有向红军投诚，而是把武器悄悄掷进顿河的冰洞里。书中这些描写，并不妨碍读者对他产生同情，甚至敬意。

## 六

不按政治教条创作，借文学描写宣示对残酷阶级斗争的不满，这是萧洛霍夫的过人之处。尤其在《静静的顿河》第二部结尾时，白军背信弃义，对自愿放下武器换取生命的红军官兵进行屠杀。一位宗教人士在死难者葬身处竖起一座神龛，木牌上面写着“在腐化动乱的年代，亲兄弟不要审判亲兄弟”，但也未能阻止红军毫不留情的报复。

茨维塔耶娃 1921 年的诗歌《俄尔甫斯》批判“同胞杀同胞”的惨剧：“一道血红泛着银白，一道银白染着血红，两条足迹傍着赫柏尔河。”茨维塔耶娃以特有的抒情深度，对红方与白方牺牲者一视同仁表示同情，喊出了响亮的人道主义强音：“啊，

我亲爱的兄弟！我的姐妹！”带给社会和诗坛前所未有的震撼。如评论家斯洛尼姆所说，茨维塔耶娃“身上具有独特的极端性，充满了真正的欲望，丰满得令人惊心动魄，使脆弱的人感到害怕，她拖着人们走向高度，令他们连呼吸也不顺爽”。

问题是，萧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太平无事，因为扛着斯大林亲自签发的“免死牌”。阿·托尔斯泰由海外回国，公开声明放弃白色立场，奉命篡改史实，创作长篇《保卫察里津》，歌颂斯大林内战“丰功伟绩”。权力令二位拥有创作“自由”及享受奢华。而茨维塔耶娃却是凭良知创作，茨维塔耶娃创作组诗《天鹅营》，就胸襟和眼光而论，是大大超越萧洛霍夫和阿·托尔斯泰的。

## 七

茨维塔耶娃写出组诗《天鹅营》，当时被归入“白色文学运动”悍将之列无疑。然而，诗人表示，这绝不是遵命之作，“如果一个白色运动的思想家对我征订、甚至下命令，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创作力最核心的部分是“辨音力”，是那种犹如在如雷贯耳大风暴中听到小虫鸣叫的才能，茨维塔耶娃少女时代就为自己拥有这种听力而自豪：“我知道，我知道很多事，他们都不知道的事！”《天鹅营》是典型的“现代性”作品，记录了时代与人性的真实一面，以及诗人冷静的理性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茨维塔耶娃为组诗《天鹅营》所作的解释：“我从来没有如此憎恨红军，也没有那般热爱白军。”尽管这话说得复杂而暧昧，尽管当时的俄国情况更复杂也更暧昧，但该表白却是理解诗人内心世界最重要的“钥匙”。

法国大革命、十二月党人、普希金、人道主义文学、俄罗斯革命……茨维塔耶娃研究时代精神变迁，一路为其叫好。为什么 1917 年革命来临，茨维塔耶娃先是毫无感觉，后又对抗、质疑和挑剔？诗人的态度正是俄国历史“大谜团”的折射。

整个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反抗皇权、为民请命，可说一直走在全社会变革力量的最前列。可是进入二十世纪，尼古拉二世政府经济成绩单分外骄人，国力也达到史上最强，一向激烈的知识分子变得前所未有地“沉稳”，沙俄司法部门统计“反国家罪”案犯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最小。而农民反对地主、工人反抗资本家、士兵抗命长官格外引人注目。所以，一举击垮沙皇的 1917 年二月革命突然来临时，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思想准备。由于这场本质上是农民造反的革命不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主导的，知识分子更没有置身革命中心，如此，质疑、不信任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

## 八

但是，有一点仍可以肯定，茨维塔耶娃对专制制度的厌恶并没有改观。契诃夫笔下人物普里希别耶夫退休中士维护沙皇暴政、野蛮干涉百姓，其臭名昭著的形象一直深植于诗人心中：“姨妈的童年时代，那儿更夫巡夜时会手持木板边走边唱：‘更夫没睡觉，已经十点啦！’于是，家家户户熄灯安寝，假如谁家不熄灯，医生便会找上门，或者干脆抓你去蹲监狱。”

诗人妹妹阿霞（阿纳斯塔西娅）在回忆录中披露，1910年，俄罗斯“良心”、激烈抗议沙皇的文豪托尔斯泰去世，茨维塔耶夫家的两姐妹凑零用钱买火车票，前往作家故乡雅斯纳亚波良那出席出殡式。到场悼念者人山人海，个个都是反沙皇专制的“叛逆”，他们大声命令维持秩序的警方一道向文豪灵柩下跪致意。

阿霞说，从自己十岁、姐姐十二岁的1904年起，她们就密切关注俄罗斯政治风云变幻。1905年革命爆发，水兵、士兵、工人代表向沙皇政府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服役期限、改善军队服役条件等要求。革命失败，起义领导人、“奥恰科夫号”巡洋舰中尉施米特被判处死刑，他是少女茨维塔耶娃狂热崇拜的对象。当然，1917年时的茨维塔耶娃已是二十五岁少妇，其想法与过去岁月产生巨大反差也不难理解。

茨维塔耶娃不满十月革命，与她当时不愉快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有关，其中最可怕的是饥馑蔓延。“整个莫斯科都在饥饿中挣扎，”诗人苦涩地写道，“走在大街上，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吸一口椴树的清香，饮一口天空中的碧蓝，尤其想吸一口那个军乐团演奏的音乐。”而在现实生活里，茨维塔耶娃看到了惨不忍睹的饥荒场面：一些“不是被狗，而是被人啃食的死尸”；有些老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吃鹰肉为生”。

哥萨克叛乱不断。这些本该站到革命一边的劳动者倒向白军，是一些红军领导人及“宁左勿右”的执政路线引发的，列宁的大量文章可以作证。首都及大城市革命后的苏维埃选举也有违公正，很多合资格市民不得参选，合资格者中间二千名工人产生一位代表，而农民背景的士兵中每二百人就可以。苏维埃成为变相的军事组织。

治安不靖，高尔基等许多知识分子忍无可忍，看不下去。“革命”群众对小偷实行私刑，把他们掷进河里，兴高采烈观赏活人如何淹死。北方贫农大会代表入住冬宫，名贵澡缸和器皿竟盛满排泄物。茨维塔耶娃在散文《回忆之井》概括十月革命：“恐怖活动、国内战争、枪杀、刑讯、旺岱（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派根据地——笔者注）、兽行、损坏圣像、无禁忌的原始冲动、流血、流血、流血……”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茨维塔耶娃要养活两个年幼的女儿，简直在绝望中挣扎。诗

人四处觅食，看够了一些嗜权者愚昧无知及专横专断的嘴脸。最痛心的是，茨维塔耶娃要领回寄养在孤儿院的小女儿伊琳娜竟不被允许，小女儿很快死去。诗人认为，夺去小女儿生命的不是疾病，而是革命后僵硬的官僚作风，这是茨维塔耶娃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愤怒。

## 九

革命者的“鲁莽”也触痛了茨维塔耶娃的良心。诗人具有预测的异常禀赋，“白银时代”诗人古米廖夫曾说她把“所有诗歌的主要手法，都本能揣测到了”。最神奇的是，茨维塔耶娃预感到沙皇会在革命中遭满门抄斩。1917年4月，尼古拉二世已逊位，诗人当时正在怀第二胎。她虽然一贯反对女诗人、女子班、女性平等运动等称谓，颇具女权主义者的坚定与强硬，内心十分“重男轻女”，总想为丈夫埃夫隆家族生个男丁。幻想跟情人生孩子，要的也是儿子。

然而，正是生男孩的期盼令诗人惊心动魄预见到沙皇的悲剧。尼古拉二世连生四个女儿，终于迎来了儿子阿列克赛的出生。皇太子虽多病，但终是传递罗曼诺夫王朝香火的希望所在。诗人清晰感到这场农民革命必定不会放过皇家的这株“独苗苗”。茨维塔耶娃诗中写道：“农民的俄罗斯啊/给皇村羔羊——阿列克赛/留下一条活命吧/可别来‘父罪子偿’这一套！”

立此存照，也一语成谶。十五个月后，1918年7月17日夜间，被布尔什维克关押的沙皇全家一改十一点就寝的习惯，枯坐到凌晨二点仍无睡意。前来装运尸体的汽车开到了楼下。沙皇尼古拉夫妇及子女、一名御医、三名侍从被带到楼下房间接受枪决。四个公主分别是二十二岁的长女奥莉佳、二十岁的塔吉雅娜、十九岁的玛丽亚和十七岁的阿纳斯塔西娅。唯一的皇太子阿列克赛才十四岁。

行刑队满足了尼古拉二世的请求，拖来两把椅子，让皇后和皇太子坐下。枪击过后，皇太子、三位公主、女侍从和御医仍活着，于是行刑队改用刺刀结果他们的性命。行刑队成员、后成为“红色外交官”的沃依柯夫回忆说：“枪决后进行毁尸，历时三天……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为革命放声歌唱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痛苦不已，在长诗《皇帝》中写道：“我们逆转了历史的脚步/永久地送别了过去/共产党员和人/不能是残酷的人。”

其实，“父罪子偿”的思维一直风靡俄罗斯的革命激进派。文豪托尔斯泰早有警惕，在长篇《复活》批判暴力主张——叫嚣对待“革命对象”须像处置臭虫一样，用炸弹炸死，连同他们的孩子。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反复向世人揭发极端分子滥杀无辜的阴郁心思和卑劣计划。萧洛霍夫长篇《新垦地》显示，“父罪子偿”的思维一

直延续到斯大林时代，钳工达维多夫被派往农村建立集体农庄，本该传播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但清算富农时竟大搞株连，连同事都看不下去，而他提出的理由竟是“富人何时为穷人的孩子擦过眼泪”？

+

十月革命期间，诗人为养家活口，饥肠辘辘、四处奔波。据茨维塔耶娃笔记本记载，她曾在街头遇到一位壮汉，从外表到神态都酷似历史上农民造反领袖普加乔夫，令她激动万分、欣喜不已。那段时间，诗人正兴致勃勃地投身戏剧活动，戏里演的正是与普加乔夫齐名的另一位农民造反领袖——拉辛。

从旧俄年代到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对拉辛、普加乔夫怀有莫大兴趣。历史上这两个农民造反领袖赫赫有名，就因为差点儿要了沙皇的命，取下皇冠给自己戴上。从全民这一“偏爱”中，可看出“俄罗斯革命变宿命”的某些端倪。茨维塔耶娃也不能“免俗”，从童年到成年一直是超级“拉辛迷”和“普加乔夫迷”。当然，这种迷恋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纯粹是文化爱好而已。但她在十月革命期间对普加乔夫和拉辛的“迷恋”，则分明另有寄托。十月革命进程中一些过火行为令茨维塔耶娃不安，诗人呼吁“暴力和善心相结合的权力者”，希望“恶的力量在瞬间变成了善的力量”。

普希金中篇《上尉的女儿》中的农民领袖普加乔夫逃避官家追捕时，靠当引路人、讨偿钱和御寒衣为生，十分落魄。布加普夫的引路人身份深深吸引茨维塔耶娃，她说，“引路人”对她有一种特殊的魔力，甚至“引路人”没念出口，“意义就清晰浮现，无须用理智去体会”。诗人说，她一生都等待“引路人”——她心中的大英雄、官家眼中的叛贼——的出现。

但是，茨维塔耶娃没有被“农民大英雄”的魅力俘获，而是把一份崇敬化为深入的探索。诗人从普希金关于普加乔夫的学术作品中，发现这位农民领袖光环所暗藏的“污点”，即对残忍暴力的喜爱以及对卑劣品行的放纵。真实的普加乔夫热衷问吊、挖眼、剥皮、挤脂肪等酷刑；攻城掠地过程中，曾逼迫十七岁姑娘做情妇，条件是免死，连同她七岁的弟弟。但这样的“爱”很快就毁于手下弟兄的猜忌，于是这个道德懦夫“把心爱的女人和无辜的孩子”交由刽子手去处置。无独有偶。另一个农民造反领袖拉辛和公爵小姐整夜寻欢，而一旦发现同伴“性嫉妒”中蕴藏不满与危险，于是当众抱起美人，一下子把她抛进波涛滚滚的伏尔加河。

普加乔夫还将最忠于他的伙伴雷索夫秘密处死，因为二人喝酒时曾吵过嘴、打过架。过后，其他战友明明已逼他们和解，双方还一道喝过酒，可是一转眼，普加乔夫就把他杀了。“和女人睡过觉，就把女人杀了；和战友喝过酒，就把战友杀了”。茨维

塔耶娃说，“真要爱，就该毛发无损放她到天涯海角”，小说中的普加乔夫就是这样做的。《上尉的女儿》写于1836年，而《普加乔夫暴乱史》写于一八三四年。茨维塔耶娃强调，普希金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善良的强盗……他为他祛魅，清除他的卑劣的所有阴影。但这纯洁光环却是人为的。人在战场上可以残暴，但和平环境，必须人道”。

## 十一

支撑茨维塔耶娃精神世界的是爱，是无比炽烈、真挚而强烈的爱，“多想有一堆篝火，把我烧成灰烬”。诗人阿达莫维奇称茨维塔耶娃的诗作：“辐射爱意并渗透爱意，它们向世界扑过去，并要把它揽入怀中，这就是它的主要魅力，这些诗是出于内心的慷慨、心灵的充溢而创作的。人们因为读了她的诗，变得更美好、更善良、更忘我、更高尚。我承认，我没有能力也不敢奢望将唯美主义贯彻到这种极限。”

茨维塔耶娃一生爱他人、爱全人类，同时爱自己，拥有巨大的内心幸福。少女茨维塔耶娃极爱钢琴家母亲，即使在母亲死后，仍觉得她活在人间，尤其当自己走在街上时，好像妈妈躲在行人中关注、跟随着女儿。在家中，茨维塔耶娃产生幻觉，看见盆栽自动走上楼梯，觉得那就是妈妈的魂魄，女儿忍着号啕大哭，要扑上去拥抱。失母，是茨维塔耶娃一辈子想起就黯然的精神剧痛。

茨维塔耶娃的“同行爱”也很感人。茨维塔耶娃早年给知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写信，说本该先给二位好朋友——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及沃洛申写信，“但我把这两个信封推到了一边。我渴望与你交谈”；“请不要以为我在收集‘签名本’，不，很多我都送了人。我什么都不珍惜，什么都不保存，唯有你的‘签名本’，我要带进棺材，放在枕头下”；“最近我将作一次有关您的讲座，生平第一次，我厌恶讲演，但我不能把荣誉让给别人……我能说的，全都是对你的赞辞”；“（女儿）阿利娅每天晚上都在祷告：‘主啊，愿天上的统治归普希金和安徒生，而地上的统治归安娜·阿赫玛托娃。’”

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这对辉煌的“白银时代”姐妹诗人，由肝胆相照到逐渐疏远、从睽隔两地到笑泯恩仇，一向是文坛的重大话题。两人后来产生了“歧见”，茨维塔耶娃认为阿赫玛托娃写诗太注重“小我”，写了太多的“爱”、“伤感”和“忧郁”，有负于时代。二人失和，性格碰撞的原因也不容小觑，茨维塔耶娃感情炽烈，不断“进攻”，有突破私谊界限之疑，令性格内向的阿赫玛托娃尴尬，却难以感动。茨维塔耶娃要求对方代看印刷校样显得“过分”，“我还有一个请求，如果人面鸟出版社接受我的《红色马》（献给您的），我又无法拿到校样的话，请替我看一下，我

相信您很认真”。以常识看，这样的亲密分明已带侵略性。茨维塔耶娃更提醒“请立即回信，把地址抄在墙上，以免丢了”，以阿赫玛托娃含蓄性格来看，这种真挚已是一种冒犯。

## 十二

十月革命期间文学晚会上，每当演讲者推崇普希金时，年轻听众就推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齐声高喊：“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茨维塔耶娃与阿赫玛托娃之间，谁更优秀？谁更革命？或者，谁更爱国？仰慕者也乐此不疲。性质颇为相近的文学家，譬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下”，也永远是学界和坊间的热门话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时，听者中有人困惑地发出追问，讲者急躁、有点发怒地重复该论断。其实，听者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情有可原，谁都知道，布罗茨基是阿赫玛托娃的文学教子，更是诗人出殡时最重要的扶灵者，但他大力赞扬的却是茨维塔耶娃——自己不仅没交往过，且连面都没见过的诗人。可以说，布罗茨基仍然敬重自己的文学教母，但对茨维塔耶娃的挚爱实在难以抑制。

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之间最大的“歧见”，可能就是对待祖国的态度了。1922年，茨维塔耶娃和丈夫团聚去了国外，阿赫玛托娃则坚决留国内，担心国门在自己身后永远关上，干脆国门都不迈。于是，她用高昂的爱国主义“充实”自己，“一个声音向着我疾呼，安慰我说：你来这里/摈弃你偏远罪恶的国土/永远离开你的俄罗斯/然而我漠然而冷静/用双手把耳朵掩住/使得我痛苦的精神，不致被贫乏的语言玷污/……对施予自己的任何打击/我们从来不曾加以规避/我们都知道/在未来的审判中/两个小时都将宣告无罪……但世上那些不流泪的人/不比我们更骄傲，更纯粹”。

但是，茨维塔耶娃的爱国心并不输给阿赫玛托娃。1939年，诗人回国前向友人回忆去国时细节辛酸之极，“离别时，我奔向刺柏丛，——它总在山顶第一个迎接我，但我却是来告别的”。茨维塔耶娃献给祖国的诗也感人肺腑，“一切家园我都视为陌路/一切庙堂我都无足轻重/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只是路旁可别出现——/特别是山楂树……”但在茨维塔耶娃看来，高于家园和庙堂的祖国是具体的，不是虚幻的。祖国就是生你的辽阔土地，养你的山川河流，抚慰你的一草一木。祖国概念不容偷换。

阿赫玛托娃爱国追求“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的境界，一如著名长篇《苦难历程》的“题记”——“血水里浴三次，碱水里泡三次，清水里漂三次”。在茨维塔耶娃的

爱国主义里，恰恰没有“含笑赴死”的情怀，连影子都没有。这也难怪，她是“恋爱可以天昏地暗，对爱情却始终要多一个心眼”的人。三十年代后期，法国大左派、文化界名人、诗人好友马尔罗访问莫斯科归来，热情赞扬红色苏联，正为回国决定举棋不定的茨维塔耶娃听得怦然心动，但紧紧追问：“有写作和出版自由吗？”回答说：“没有。”一听没有，茨维塔耶娃一脸阴沉。既然对爱情都多一个心眼，遑论写作自由？但这不是机灵，而是常识，如马克思所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亦如美国开国领袖之一杰斐逊所示，“限制出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是对人民理智的摧残”。

斯大林的大清洗政策把茨维塔耶娃无比纯洁的女儿阿利娅捉进监狱，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也被当局拘捕，生死不明，“我恳求了整整十七个月/我的哭声把你召唤回家/我跪倒在刽子手面前为你求情/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我的亲骨肉”。

两位诗人母亲为清白无辜、身陷囹圄的儿女打探消息。她们在莫斯科重逢见面，谈了一整天，次日又是大半天，但说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若干年后，阿赫玛托娃向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承认，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比她优秀的诗人：“她具有爱国主义，但拒绝国家主义，也不冒有国无法回的险。”

人类高于民族，超越祖国。茨维塔耶娃拒绝的远不止是国家主义，她还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世界公民”、国际主义者，“俄罗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爱法兰西，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爱德意志”。茨维塔耶娃说，她愿把雨果、大小仲马、巴尔扎克、乔治·桑及其他许许多多法国作家看成“我们的民族作家，将他们视为当代俄国文学先驱也不为过”；而德国，这个“谦逊质朴、相貌平平的邻居”，“很久以前我们就将其代表人物奉若本国精英”。

茨维塔耶娃对世界上各民族也充满大爱，她说，在漂泊法国的岁月里，不要说“种族相近”的南斯拉夫人、“教养类同”的德国人、“习性相似”的意大利人，甚至“傲慢”的波兰人和“可疑”的阿拉伯人，她都无一例外、无所选择地喜欢。这种喜欢达到不可理喻乃至神差鬼使的程度，只为多听一次“怪腔怪调的‘谢谢’和斧头劈下似的一声‘太太’”，茨维塔耶娃都会多去“外邦人”摊位一次，“去握一握阿拉伯人的手、黑人的手抑或我自己也弄不清的哪个民族人的手”。法国摊贩吹嘘“法国沙丁鱼而大骂葡萄牙沙丁鱼”，完全与俄国无关，茨维塔耶娃也认为“触犯了我，刺痛我的心”。

## 十三

在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交集的命运里，出现了法捷耶夫的身影。就文学才华